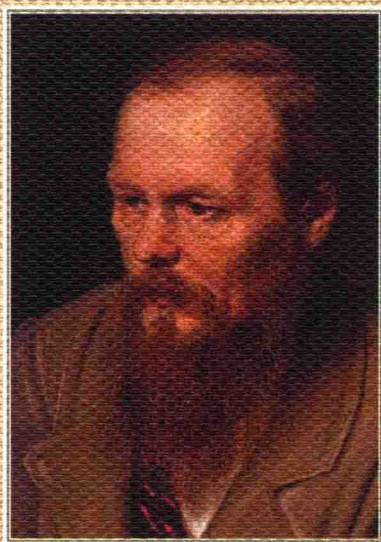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 著
磊 然 郭家中 / 译



长篇、中短篇小说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长篇、中短篇小说

(1846—1847)

穷人

化身

九封信的故事

普罗哈尔钦先生

女房东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 著

磊然 郭家申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全 20 卷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耿济之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3382-6

I . ①陀… II . ①陀… ②耿… III . ①俄罗斯文学—
近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 ① I5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3580 号

出版统筹 全保民
策划编辑 张福生
责任编辑 陈黎
特约策划 李江华
装帧设计 刘静
责任印制 芑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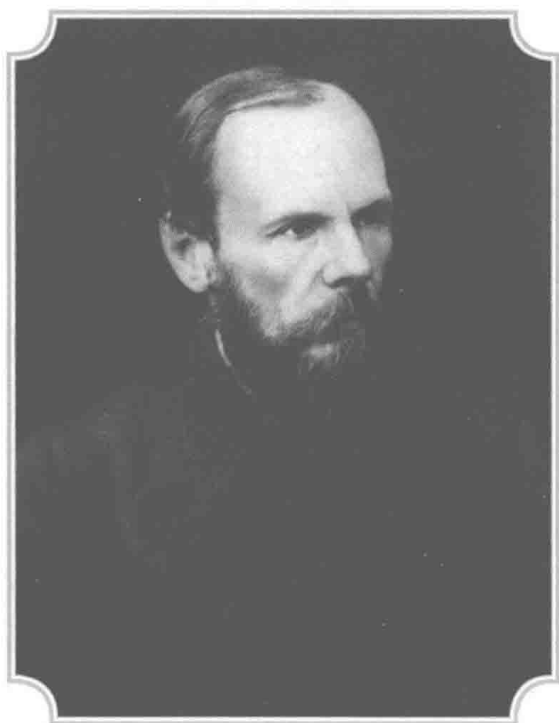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8000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597
印 数 1—4000
版 次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382-6
定 价 1980.00 元 (全 20 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陀思妥耶夫斯基

总 序

在俄国的文学殿堂上，居于前列的诗人或者作家几乎都是殉道者。拉季谢夫、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奥加辽夫、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柯罗连科：他们的命运是自杀、遭杀害、囚禁、贬谪、流放、流亡，最幸运的（如别林斯基）也是以早死而免陷囹圄。列夫·托尔斯泰虽因其声望而幸免，但也受秘密监视，以至被革除教籍，列为教会定期诅咒的对象。在这部文祸史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显得十分突出。他和后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被判处死刑，临刑前才传来沙皇的赦免令——改处服苦役后再当列兵或流放。如果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忠贞不屈，成为“文学界的普罗米修斯”（普列汉诺夫语），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虽则不惜妥协，仍被秘密监视终身。政治上的这些迫害，给他的世界观以巨大震荡。人们称他为“残酷的天才”（尼·米哈伊洛夫斯基语）或“病态的天才”（卢那察尔斯基语），我认为他乃是被扭曲了的天才。

费奥尔多·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出生于一个军医家庭。父亲因晋升八级文官，获得贵族身份，并购置了两个小田庄。这是一个暴躁任性、专横冷酷的人。他的妻子玛·费·涅

恰耶娃(作家的母亲)善良贤惠,因不堪他的妒忌和折磨,很早去世。而他自己,据说因虐待田庄上的农民,在田间被他们聚殴致死(一说可能是被殴打后死于中风^①)。

费奥尔多虽然爱好文学,但因父命难违,于一八三八年一月进入军事工程学校念书。当时他就耽于思考,在那时致兄长米哈伊尔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已在思考人生意义。他因当时只能“无休止地过闲适的生活”,感到“活着而没有希望是可悲的”(XXVIII - I/54)^②。这是一个早就向往冲霄高举的少年的烦恼。在信中他还表示向往自由:“我只有一个目标:自由。为了它我可以牺牲一切”。也就在此信中他还写道:“人是一个秘密,要识破它,如果我一生都在猜度这个秘密,那你也别说浪费时间。我正在研究这个秘密。因为我要成为一个人。”(XXVIII - I/63)可见他当时就已在探索心灵的秘密,而从“人是一个秘密”一语可以知道他当时已是一个心灵复杂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好始终是文学。在幼时,他就间接直接地接触到俄国文学和西欧文学。现在在学校里,于夜阑人静之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欧文学,同时开始写作。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军事工程绘图处”,对此工作他感到索然无味。他坚信自己“是一位诗人,而不是工程师”。翌年便呈准退役,专心致志于文学工作。他早期曾受感伤主义影响,但更醉心于浪漫主义,在工程学校写的两个悲剧片段,就是浪漫主义的习作(没有保留下来)。此时,即退役后,他翻译并发表了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意味着他转向现实主义。实际上,早在一八三八年八月九日他致兄长的信中,就谈到自己几乎读完巴尔扎克全部作品,赞叹“巴尔扎克伟大”,说他笔下的人物性格是“全世界的理

① 参阅韦·斯·涅恰耶娃:《早期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49)》,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94页。

② 本文中引自《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30卷集,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72—1990)的引文,只于括号中标明其卷数和页数。

智的产物”。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是通过研究性格及其在“人的心灵”中的形成来研究“人和生活”。^①他的转向现实主义，是他醉心于学习巴尔扎克的结果，而翻译《欧也妮·葛朗台》只是其表现之一罢了。此后不久，他就写出了处女作《穷人》。

《穷人》写成后，由他的同学、初露头角的作家德·格里戈罗维奇（当时与他居住在一起）把稿子送给出版家、诗人涅克拉索夫。后者十分赞赏，当天晚上他与格里戈罗维奇津津有味地轮流把这部长达七印张的小说稿一口气读完，拂晓时便一起去看望作者。随后涅克拉索夫又带稿子去见批评家别林斯基，并且说“又一个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也是一口气读完，赞许这位年方二十五岁的作家为“天才”，当这位作家翌日去拜访他时，他又预言作者会成为“伟大作家”。别林斯基是当时俄国批评界的权威，受到他的激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确是受宠若惊。他晚年回忆说：“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这颗新星就这样迅速而璀璨夺目地出现了。

当时俄国文坛，普希金与莱蒙托夫都已去世，而包括像屠格涅夫那样的后起之秀，也才闪现微弱的光芒。果戈理则是文苑中的宿将和盟主，成为“另一个果戈理”，真是超逸群伦，大大出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意料：“难道我真的如此伟大？”可是，面对一片赞扬声，他未免有点陶醉，未免自视过高，甚至说别林斯基等人发现“我远远超过果戈理”。据女作家阿·雅·巴纳耶娃说，他过分自负，以致别林斯基周围的文学家“在闲谈中用带刺的话”来刺激他，其中屠格涅夫还写了冷嘲热讽的打油诗《赠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忍受他们前恭后倨的态度，时常与他们争论。加深这种裂痕的是他以创新自赏的小说《化身》（旧译《双重人格》或《同貌人》等），没有得到别林斯基的应有评价。这里的问题在于他们文艺观的不同，他们对文学使命看法的不同。别林斯基要求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揭露社会矛盾，从

^① 参阅韦·斯·涅恰耶娃：《早期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49）》，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104页。

而促进、推动社会的改革和发展,而当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首先追求艺术上的创新——致力于人物内心的发掘。这种倾向在《穷人》中已是他的着重点,及至《化身》,尤其是后来的《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则更为突出,因此别林斯基逐渐对他感到失望。往后的发展,更显出他和别林斯基在社会思想上的重大分歧:一个是基督教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另一个是激进的、罗伯斯庇尔的崇拜者。因此,不久,他就和别林斯基周围的文学家以至批评家本人绝交了。

此后,他的命运发生了悲剧性的“突转”——由顺境转入逆境。

早在一八四六年春,他邂逅空想社会主义者米·尼·彼得拉舍夫斯基。从一八四七年春,便开始参加后者组织的小组“星期五聚会”。小组中各个成员的观点是不一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信仰傅立叶学说,认为这是一种“和平的体系”,以“博爱”鼓舞人,限于“经济改革”“不诉诸政治改革”。但他却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左翼、激进派尼·亚·斯佩什涅夫的小组,参与后者建立宣传解放斗争的秘密印刷所及发动政变的计划。

不过,从事政治活动,似乎很少在他当时的艺术创作中得到反映。仅有《枞树晚会和婚礼》里表现出傅立叶的思想影响。而写女歌唱家生活的《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则几乎是冲淡以至回避社会矛盾,仿佛与当时赫尔岑创作的出身农奴的女演员遭受班主老公爵迫害的《偷东西的喜鹊》进行辩论。

一八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案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该小组成员共三十四人同时为沙皇政府逮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罪名是在“星期五”小组会上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信中提出“废除农奴制、废除肉刑”等主张。这封信是当时地下传抄的违禁品。据说,他在会上还附带读了果戈理的复信,可能以此说明他并非完全同意别林斯基的观点。在审讯过程中,他光明磊落,主动承担责任,竭力为同志们辩解。最后他被判处死刑。但这是假死刑。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他和同案犯被押赴刑场——谢

苗诺夫校场。临刑前宣读沙皇谕旨，免去死刑，改处服苦役四年，之后再充当列兵五年。对于这次死刑，彼得拉舍夫斯基坦然处之，在刑场上甚至采取挑战性的嬉笑态度：他在穿上白布殓衣时纵声大笑说：“先生们……我们穿上这件又大又肥的长袍……一定会显得滑稽吧！”但这假死刑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起到了沙皇所预期的效果。自刑场归来的当天他写信给兄长，一方面说自己“绝不灰心”——主要是说决心要继续从事创作：“假如不能写作，我将会死去”；“只要手能执笔，宁愿监禁十五年”。另一方面则沉痛地声称：我们以前的“各种希望在这一瞬间已被从我内心挖出埋掉了”！（XXVIII - I/163）他的信念和理想开始动摇了。此后四年苦役的“炼狱的生活”，精神上的极度孤独，又使他“逐一检查过去的一切，严厉无情地批判自己”，并暗自发誓，“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和过失”，也就是说决计改“过”自新了。当然，这种转变极其痛苦、十分曲折而又充满矛盾：他内心深处的反抗意识有如巨石底下的小草总是不断地扭扭曲曲地冒出来。

服苦役期间，没有通信的自由，他当时的处境、所受的折磨和心灵上的痛苦，唯一并只是片段地见于他的《死屋手记》。在这孤独的生活里，他唯一的读物是一本《圣经》，而且当时他每天早上要与其他苦役犯一起上教堂做礼拜。据他后来在《作家日记》的《一篇当代的谎言》中说，是这段生活，与人民（罪犯与士兵——他们原来都是农民或城市下层劳动者）接触，使他幡然悔悟，认识到知识分子与人民的信仰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恢复了他因作为“欧洲自由派”而一度失去的对基督的信仰。这段话是难以令人相信的。须知正如他在《死屋手记》中写的，他在狱中看到人民与贵族的势不两立，看到受贵族和沙皇政府迫害的人民，看到严重的社会矛盾，也看到出身人民的囚犯的反抗。实际上，这是他在后期由于政府的压力，思想动摇，丧失了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民主主义影响下形成的理想、信念与追求，而转向温顺、驯服的人民的东正教，也可以说是回归到并加强了出身于东正教家庭的他原来的信仰。

苦役期满后当兵,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酷爱读书的他,刚刚离开流放地,就写信给兄长,要求给他寄书。书单中除《祖国纪事》和宗教书籍(包括《古兰经》)外,还有康德、黑格尔以及基佐、梯叶里、梯也尔等人的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他说:“书籍是我的生命,我的粮食。”这些书籍虽然只收到一部分,但对他的思想颇有启发。服苦役时孤独和严酷的生活,使他沉入思考,像他自己说的:“我赖以逃避痛苦现实的经常自我专注……带来了自己的‘果实’”(XXVIII - I/171)。阅读这些著作和自我专注的果实确实丰硕。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期作品与前期作品的明显差别。文艺学家帕·尼·萨库林院士十分中肯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成熟的作品都溯源于苦役和流放的岁月。”^①

文学事业现在成了他的生命。他不惜一切,谋求恢复发表作品的权利。于是他向生活伸出了橄榄枝。他先是按官方的调子写了一首《有感于一八五四年欧洲事件》的诗,博得当时的上司步兵营长的青睐。命运之神也在此时开始向他微笑。当地一位新上任的省检察官亚·弗兰格尔,过去读过《穷人》等作品,并曾经满怀同情目击在刑场上的他,现在便屈尊与他这个列兵结识,也正由于弗兰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得以出入当地上流社会圈子,成为营长、法官以至总督家中的座上客。一八五五年夏他写了另一首诗《一八五五年七月一日》(尼古拉一世皇后生日),请求转呈皇后;一八五六年春又为新皇亚历山大二世行加冕礼与缔结巴黎和约写了颂诗。他还不顾军纪规定,致函现任皇帝侍卫长爱·托特列边(他同学的兄长),表示悔过,说自己的思想、信仰以至整个人都在变化。但沙皇并未因此同意让他发表作品,虽然批准他晋升准尉,却还命令对他予以秘密监视,待查明他政治上是否可靠后再作定夺。不过,实际上他在次年四月就恢复了贵族身份,八月,他被捕时写于狱中的《小英雄》就由他的兄长米哈伊尔以

^① 转引自谢·约·富德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产》,莫斯科,俄罗斯道路出版社,1998年,第81页。

М-ий为笔名在《祖国纪事》上刊出。

他的夙愿终于在一八五九年实现：先是获准以陆军少尉军衔退役，并恢复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年底又被批准移居彼得堡。重返文坛对他来说意味着生命的复苏，虽则仍受监视。

阔别十年，俄国文学界已面目一新：除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赫尔岑、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阿·费·皮谢姆斯基以及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名作家和剧作家外，列夫·托尔斯泰作为后起之秀也已崭露头角。陀思妥耶夫斯基饶有兴趣地阅读屠格涅夫等人的新作，并满怀信心和豪情“要同所有人较量”。与此同时，由于新登基的亚历山大二世较为开明，主张尽快废除农奴制，并准备实行一些社会改革，政治氛围已有显著变化。自由主义的倾向到处呈现，新刊物如雨后春笋，书刊检查有所放松，平民知识分子逐渐出现于社会前景，社会舆论也显出自己的面貌。但随着这些变化，文学界出现了新的分歧，围绕迫在眉睫的农奴制改革问题展开论争，过去别林斯基的《现代人》杂志中的同仁分裂为自由主义者与革命民主主义者两个阵营，与斯拉夫派鼎足而三。陀思妥耶夫斯基同《现代人》早就断绝了关系，虽然自流放地回来之初，涅克拉索夫仍然表示欢迎，希望他为《现代人》撰稿。但现在他要走中间道路，并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根基论”。自一八六一年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先后主编以他兄长米哈伊尔名义^①创办的《时代》（*Время* 旧译《时报》，1861—1863）和《时世》（*Эпоха* 旧译《时代》，1864—1865）两个杂志。^②这是他宣扬根基论的阵地，一八六〇年十月为《时代》写的征订启事便是根基论的宣言。其主要思想是：人民是历史的根基，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知识界）应当在宗教伦理的基础上与人民——根基相结合。不过，他所谓的“人民”并不限于农民，也

①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因过去犯过罪，所以不能申请担任杂志主编。

② *Время* 与 *Эпоха* 原为近义词，“时代”与“时世”也是近义词。*Время* 刊物，不是报纸，我国过去因为把 *Эпоха* 译为《时代》，只好把 *Время* 译为《时报》。有关材料，均沿用《时报》名称，实际上是欠妥的。

包括小市民以至部分贵族(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还主张包括商人),主要的大抵是那些忠于沙皇、笃信东正教的“老百姓”——是那些谦恭温顺、逆来顺受的人(如《罪与罚》的索尼娅、《群魔》中的跛女人玛丽娅),包括贵族的家奴(《少年》中的马卡尔是他的理想人物)。^① 这种理论“把当时已经形成的资产阶级君主制视为管理国家的最进步形式……这便是知识界同农民、沙皇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宗法制田园生活。”^② 总之,《时代》杂志无视日渐激化的阶级矛盾,甚至否认俄国历史上有过阶级对抗,说历史上只有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和睦相处。

《时代》的主要合作者,如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和尼·尼·斯特拉霍夫都是与他志同道合的批评家。前者是根基派首倡者之一,后者则是斯拉夫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时代》上发表了很多论文,部分是政论,部分是文论,大都贯穿着论战。《时代》一般说还能持中间立场,它左右开弓,既批评曾是自由派、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变为亲政府派的米·尼·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又与革命民主派的《现代人》论争。不过,他虽然在革命问题上与《现代人》分歧严重,但因为国内民主主义的高涨,他力求与社会进步力量同步,要找到与《现代人》的共同点,因此受到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的非议。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间立场在艺术观上表现为:既不同意以诗人阿·阿·费特为代表的纯艺术论,又反对以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虽然杜勃罗留波夫也是重视艺术性的);既主张创作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可以听任艺术家自由发挥意见,又强调:“艺术永远是为当代服务和有实际效用的”,并且坚定地断言“从未有过也不可能

① 格·米·弗里德连杰尔认为,在《死屋手记》之后,作家“故意不看他眼前发生的人民群众的心理和情绪的变化。因此在此后的作品中,来自民间的人物一成不变地扮演同一角色,亦即体现逆来顺受、默默地服从于命运,毫无怨言地在精神上顽强地忍受贫困和痛苦等品质的典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64年,第108页)

② 列·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83页至284页。

有别的艺术”。应该指出,他的创作实践表明,他的确不愿为艺术而艺术,而且的确是“为当代服务”。但问题在于他是怎样为当代服务的,这一点在他后期信念变化后表现得十分突出。

《时代》的中间立场仍然不能为沙皇政府所容忍,终于因尼·斯特拉霍夫的一篇论波兰起义的文章《一个不祥的问题》而被迫于一八六三年五月停刊。一八六四年一月,随之创办的《时世》殷鉴前车,迫于当时严峻的社会政治形势,严格按照当局的要求——“保持无可指摘的倾向”,整个地向右转。一八六四年,在兄长米哈伊尔逝世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一个阐明《时世》新倾向的十分详细的启事:《谈谈由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主办的文学政治月刊〈时世〉的出版》(XX/399),^①文中谈到必须继承《时代》杂志的根基论传统,而有些地方则采取更保守的立场。启事中说:“如今真正的俄罗斯人的特征是——现在要知道,恰恰是现在,不应斥骂我们的罗斯。不应指摘,也不应谴责,而是要善于爱——这才是当前真正的俄罗斯人所应该做的。”(XX/217)下文还强调“根基论”,这种论点曾受到《现代人》“局外批评家”(革命民主派马·亚·安东诺维奇的化名)的批评。(XX/400)从此时起,《时世》的方针就是反对“虚无主义者”,同《现代人》论战,也就是同革命民主主义者以及他们所主张的无神论、社会主义思想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他有时直接通过文章,有时则以艺术作品作为论战的手段。如《时世》创刊号上发表的《地下室手记》第一部分,就是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利己主义论争的;而第二期上的《鳄鱼》,则一般被认为是影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当时这位批评家已被捕,这不啻落井下石(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作家日记》中曾为自己辩解,否认自己有此意图)。此前,他在《时代》上还曾发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该作品的中心问题是“俄国和西方”,亦即俄国今后的发展是走西欧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或是采取独特发展

^① 这篇启事由当时任《时世》名义上的主编的 A. Y. 波列茨基署名。

的形式——继续保持君主制的国家，作家是倾向于后者的。他根据自己于一八六二年六月至九月第一次出国，参访德、法、英、意和瑞士等国家的走马观花式的见闻，写下了这篇文章。对资产阶级的欧洲，完全持批评和讽刺的态度，这种反资产阶级的立场，是值得肯定的。他所描述和批评的西欧资产阶级社会的消极面也是符合实际的。但与此同时，他却完全否定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否定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以及平等、博爱、自由等口号的进步意义（虽则它们有一定的虚伪性），“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①他没有、也不愿看到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较之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优越性，当然更不可能知道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俄国也要走（实际上当时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而陶醉于理想化的俄国人民的宗法制的生活。他对“俄国与西方”的这种看法以不同形式见于此后的思想和创作中。

此后写成的长篇小说《罪与罚》，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大作家在创作艺术上趋于成熟，同时也标志着他最终转到新的思想立场——在创作中首次表现宗教思想和反对虚无主义——实即革命民主主义，而这两者此后以不同程度贯彻于他的全部长篇小说。而且该小说发表于尼·米·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固然还有其他客观原因），不久以前他还同这位当时已转变为亲政府派的出版家论战，而且从该小说起，除《少年》外，全部长篇都发表在该刊物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虚无主义”的依据也是“根基论”。在他看来，革命民主主义者似乎脱离了“根基”，不信奉“人民”所信奉的东正教而宣扬无神论，不学习“人民”效忠于沙皇，却主张社会主义革命。不过，也应该指出，在文学创作中反虚无主义的始作俑者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1862）。但屠格涅夫对书中主人公巴扎罗夫还不是完全

^① 对《冬天记的夏天印象》这个作品，俄苏批评界一般只肯定其批判资产阶级的积极一面，很少谈它的消极方面。弗·弗·叶尔米洛夫在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一书中对其反对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积极意义的一面，作过充分的分析与批评。

否定,而此后的阿·费·皮谢姆斯基和尼·谢·列斯科夫等人对虚无主义者则是恣意攻击。在这股浊流中,应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其最激烈的《群魔》一书中,也没有达到极限。

这里要附带谈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信仰的复杂性。他在一八五四年给娜·德·冯维辛娜的信中说:“……我是时代的孩子,直到现在,甚至……直至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子……”(XXVIII - I/176)直到一八七〇年,他在致阿·尼·迈科夫的信中谈到准备写作《大罪人传》时又说:“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我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终生为之苦恼的问题——上帝的存在。”(XXIX - I/117)但他在给上面冯维辛娜的信中却又说:“……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在于真理之外,而且基督与真理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怀疑上帝的存在,而又坚决与基督在一起!这种信仰上的矛盾实际上贯穿在他的终生思想中,也贯串于他的后期创作中。

《罪与罚》的问世提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作家的声誉”,而正是在创作《罪与罚》过程中,他迎来了迟到的爱情。说“迟到”,是因为此前他曾有过爱情,而且还不止一次,但都成了镜花水月。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次恋爱,颇能显示他的性格的一个侧面,同时也给他今后的创作提供了一些妇女形象的原型。

他是一个秉性孤僻、落落寡合的人,内心却燃烧着炽烈的感情。可他“不习惯于和女人来往”,“甚至不知道怎样同她们交谈”。有人指出,他在主要作品中写的都是充满牺牲和痛苦的爱情,也许是他的某些自我经验的写照。他的“初恋”对象是秀外慧中的女作家阿·雅·巴纳耶娃,面对这位活跃开朗而又雍容华贵的上流社会贵妇人,初登文坛的他不敢有所表示,却曾为之神魂颠倒。她的妩媚外表和复杂性格后来被赋予《白痴》的女主人公。此后,经历了四年苦役的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孤独,他憧憬家庭生活,渴望一个温暖的安乐窝。在当列兵的时候,爱上了小官吏亚·伊萨耶夫的妻子,据说是“相当漂亮”“活泼敏感”、出身贵族、颇有教养的女性。伊萨耶夫因嗜酒而潦

倒落魄,人虽善良,却很神经质、喜怒无常,而又体弱多病,不久患了肺结核。她和丈夫很像《罪与罚》中马美拉多夫夫妇,有人认为,前者就是后者的原型。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她开始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爱得发疯,她却犹豫不决。不久伊萨耶夫去世,她曾另有所爱。当时的几封信反映出他焦急和痛苦的心情。几经周折,他还因狂热的爱发过一次癫痫病,最后因他当上了军官,又恢复了贵族身份,好梦终于成为现实。但这次婚姻,说不上什么幸福。她并不爱他,而且根本不了解作为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价值。她动辄发怒,而又无端争风吃醋,夫妻间经常反目,她甚至骂他是“苦役犯”!这场并无真正爱情的婚姻,以她于一八六四年病逝而结束。

但就在她去世前,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过一些浪漫史。他于一八五九年冬至一八六〇年曾恋上了他的医生斯·亚诺夫斯基的妻子——女演员舒伯特。后者出身农奴家庭,因而持有民主主义观点,但很快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结束了这次危险的恋爱。

一八六二年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爱上了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这是他较长期爱恋的对象。她也出身农奴家庭,却受过高等教育,天真烂漫,富于幻想。她最初十分崇拜这位因革命思想而受苦受难的有才华的作家,想给从“死屋”中逃生的他以温暖。但热恋不久就退潮了。据说她甚至认为,任何才华也不能弥补“性格的卑劣”,并认为自己蒙受了“屈辱和痛苦”。于是爱变成了恨。加之她从十六岁起就激烈否定“旧世界”及其艺术、宗教、民族文化等等。这位女虚无主义者甚至准备参加反政府的恐怖活动。两个思想上十分矛盾的情侣激烈争论过许多问题,他们的紧张关系时断时续。直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安娜·斯尼特金娜结婚两年后,她还经常来信。这位苏斯洛娃是《赌徒》中女主人公的原型。

此外,在妻子玛·伊萨耶娃逝世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先后又有过两次短暂的恋爱,其对象一个是放荡不羁、个性很强、颇有文化教养、在国外漂泊过数年的马尔法·布劳恩;另一位是炮兵中将兼大地

主的女儿，美艳而高傲，并且正在开始文学创作的安娜·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前者在他许多作品中留下身影；后者也是虚无主义者，她与他结识，但限于友谊，因思想分歧，拒绝了他的求婚，后来嫁给一位法国革命家。她是《白痴》中阿格拉娅的原型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有点像《白痴》中的梅什金），却一再追求热情奔放、美艳迷人的女性，作为虚无主义的敌人而一再与女虚无主义者谈爱，其间不乏浪漫情调，不断失意自在意中。他最后采取务实态度，当然也由于机缘，终于获得真正的爱情。这次爱情来得平静，却异常迅速。月下老人是他的《赌徒》。一八六六年九月底他因此前同出版商费·斯捷洛夫斯基签订了十分苛刻的合同，必须在十一月一日前交出一部篇幅在十二印张以上的小说稿，否则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位出版商可以无偿地、任意出版他此前的作品。但他当时正在写《罪与罚》，难以分身。听从友人亚·彼·米柳科夫的建议，他聘请了一位女速记员，记录他口授的作品。这位女速记员就是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斯尼特金娜。她自许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进步青年，也主张男女平等，但并不喜欢“虚无主义”。她热情而又善于自持，看来是讲求实际的人。她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初印象不佳，但不久她就以敏捷、准确的记录博得他的好感。他也渐渐注意到她“可爱的容貌、青春的魅力和独特的风韵”。在二十六天内他口授完了《赌徒》。二十多天的写作过程也酝酿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不久，他向她求婚。她当时二十岁，而他是四十四岁，相差二十四岁，但她早就崇拜这位大作家，因此欣然应允，很快就结了婚。她真正给他带来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家庭幸福。她不仅干练地安排好他的众多人口而又有点“偶合”色彩（他的寡嫂一家极难相处，他前妻带来的儿子又桀骜不驯）的家庭的生活，多方设法偿还了他历年负下的巨额欠债，而且促使他幡然悔悟，抛弃了赌博狂热。此后不久他渐渐无后顾之忧，过着衣食无虞的写作生活，他的创作进入空前高产的时期。她和列夫·托尔斯泰夫人，都是她们的丈夫——大作家在生活 and 创作